

# 传承与分立：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中所见胡人形象<sup>\*</sup>

朱浒

战争和割据、民族对立和融合、外来宗教的深入传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大主题。不同的胡人族群在这一时空内分化和糅合，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在中国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北魏的建立者鲜卑人成功实现了汉化，其主要分支逐渐融入到汉族中。遥远的西域胡人如贵霜人、波斯人、嚙哒人、粟特人等，持续入华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北方草原游牧帝国柔然、突厥，为中国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异域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成果，共同为中古时期中华文化多元性的形成贡献了力量。

从考古遗存中看，胡人图像在魏晋南北朝墓葬中出现的频率和丰富程度都远超汉代和同时期的六朝墓葬。在已发掘的上千座墓葬中，胡人形象的载体也更为丰富，除了墓室壁画外，还有大量胡俑、带有异域风情的石质葬具以及舶来艺术品。它们承载了重要的考古学和文化史意义，也成为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胡汉民族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把钥匙。尤其佛教、火祆教在自西向东传播中逐渐深化，胡人主动承担了宗教传播者的角色。

墓室壁画是研究魏晋南北朝艺术史的重要载体。河西地区在魏晋十六国时期流行彩色画像砖墓，东北地区十六国贵族依然使用壁画墓。近年考古中，平城附近发现了北魏早期的壁画墓和石椁画像等，流露出多元文化的影响。尤其在北朝后期，涌现出一批艺术价值极高的壁画墓，以娄叟墓、徐显秀墓、新发现的九原岗墓为代表。在壁画墓未流行的南方地区，墓葬装饰仍以画像砖为代表，但也存在一些特殊个案，同北方墓室壁画遥相呼应。这些壁画中存在为数众多的胡人图像，尚未有学者对其进行全面整理。尤其是近年北朝壁画墓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关系、文化交流与宗教融合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以下，本文拟在对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中胡人形象相关问题尝试做一梳理及论述。

## 一 魏晋、十六国时期

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室壁画，主要集中在四个区域，分别是河西地区、新疆地区、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其中，河西地区壁画墓中的胡人图像数量最多。其它地区仅有一些零散个案，并未形成主流，但仍表现出各自的特点。江南地区没有壁画墓的发

---

<sup>\*</sup> 本文是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2012SJB760012）的阶段成果。

现，主要流行砖画。

### （一）河西地区

汉末中原动乱，地处丝绸之路要道的河西走廊地区等地区的军民，却因为战事鲜及而享受着相对平静的生活。关内的战乱导致移民涌入，将农桑技术与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入这一地区。“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至丰积。”（《后汉书·孔奋传》）尽管中原动荡不安，但河西安宁，经济繁荣，逐渐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

河西地区独特的地域背景产生了独特的文化，长久以来，被掩埋在黄土之下不为人所知。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至新疆地区发现了以嘉峪关新城墓地<sup>(1)</sup>、敦煌佛爷庙湾墓地<sup>(2)</sup>、敦煌祁家湾墓地<sup>(3)</sup>、张掖高台地埂坡墓地<sup>(4)</sup>等为代表的魏晋至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将人们的视野集中于这一地区特殊的墓葬艺术形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视其地域文化的大门。从内容上看，这些砖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表现时人的劳动场景。农牧生产是河西人重要的经济来源，以狩猎、采桑和牛耕等主题出现频率较高。其二为表现墓主人的财富和享乐生活，主要有牲畜图像、宴饮、庖厨和出行等。佣人守在灶边烧火做饭的图像也随处可见。其三是表现军事题材的绘画，如屯田、坞堡和操练的图像。这三类砖画中均散存有不少胡人形象。

张掖高台县分布有汉晋十六国时期的四大墓群，2002年高台县西北罗城乡河西村地埂坡发现5座墓葬，其中M4中发现有数组胡人图像。该墓中的胡人图像分为两类，第一类图像为髡发人物（图1）<sup>(5)</sup>，打着绑腿，分别进行角抵戏、敲鼓，位于M4前壁墓门上部。第二类图像为头戴尖顶帽的胡人（图2）<sup>(6)</sup>，须发茂密，对坐，位于前室北壁立柱内西侧，但其容貌并未表现出高鼻深目的特征。



图1 甘肃高台地埂坡晋墓中的河西鲜卑人 图2 甘肃高台地埂坡晋墓中的尖顶帽胡人

首先，对髡发带辫的人物形象，学者多有讨论。一般认为，这种人物是鲜卑人形象。据《三国志·乌丸传》记：“（乌丸）父子男女相对蹲踞，悉髡头以为轻便”，“鲜

（1）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 《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敦煌佛爷庙西晋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台县博物馆 《甘肃高台地埂坡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9期。

（5）吴苾、王策、毛瑞林 《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4期，第80页。

（6）韦正 《魏晋南北朝考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

卑……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吴荭等人指出，“因《后汉书》和《魏书》中对鲜卑、乌桓均采用髡发的记载，使得这一发型被认为是东胡系民族的标识。……河西鲜卑一般指活动于兰州黄河以西的鲜卑部落，地埂坡壁画反映的应是河西鲜卑的普遍发型。河西鲜卑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与拓跋同源的秃发鲜卑了，其发型似不应与壁画图像相抵触。”<sup>(1)</sup>

其次，尖顶帽的胡人，在魏晋时期较为常见，应为来自西域的西胡人，可能和贵霜（大月氏）人有关。从细节上辨认，甘肃高台地埂坡晋墓发现两位头戴尖顶帽的胡人，其帽中央有一竖纹。邢义田教授指出汉代胡人的帽式是区分其种族的重要特征，并将其分为三类，分别是单纯的尖顶帽、带护耳的尖顶帽和带飘带的尖顶帽<sup>(2)</sup>。进入魏晋后，这一分类依然清晰。孙吴和西晋墓中有一种头戴尖顶小帽、双手合于胸前的胡侍俑，其胡状容貌大甚分明。河南博物院藏头戴中央带竖纹的尖顶帽的胡人俑（图3-1），其头发弯曲、高鼻深目，显然是西域胡人的形象，具有典型的“印度-希腊”贵霜人的形象特征。这些胡人的帽式同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出土青瓷胡俑<sup>(3)</sup>（图3-2）和长沙郊区晋墓出土的陶俑<sup>(4)</sup>（图3-3）的帽式几乎一致，可见河西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胡人在形象上有相通之处，或可证其族群来源的一致。这类中间带一竖纹尖顶帽的胡人的种族应该主要以大月氏人为蓝本，也可能是留在当地与羌族杂居的小月氏人。

另外，高台骆驼城魏晋墓群中也有高鼻深目、头顶圆形发髻的胡人放牧的图像。如



图3 魏晋南北朝“中间带一竖线”的尖顶帽胡人

图4，这一图像生动反映了当时胡人的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sup>(5)</sup>。而图中人物左上角的骆驼图像也暗示了河西地区在丝绸之路中的重要位置。

1971年酒泉下河清五坝河修建水利时发现砖画墓，其中有一幅胡人习武图。二人皆高鼻深目，蓬发，身着青绿色交领短衣，束腰，下着裤。一人执戈，一人射箭

(1) 吴荭、王策、毛瑞林 《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第81页。

(2) 邢义田 《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材料中的“胡人”外貌》，收入氏著《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7~299页。

(3)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 《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2期，第26页。

(4) 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两晋南北朝隋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84~85页。

(5) 袁融主编 《甘肃高台魏晋墓》，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图4 甘肃高台骆驼城魏晋墓胡人图像



图5 酒泉下河清五坝河壁画胡人图像

(图5)<sup>(1)</sup>。张朋川认为其种族应是嚙哒、焉耆、大月氏或小月氏人<sup>(2)</sup>，孙彦沿袭了这种说法<sup>(3)</sup>。笔者认为，这类高鼻深目、短发的胡人应来自西域，居住在河西地区的胡兵。由于此类图像具有程式化，其种族很难判定，只能将其归为高加索人种的西胡人。

同时具有尖顶帽和高鼻深目特征的人物形象可见嘉峪关新城 M5 (图6)<sup>(4)</sup> 和酒泉丁家闸 M5 (图7)<sup>(5)</sup> 中，日本学者园田俊介将其考为小月氏或羯族的形象<sup>(6)</sup>，其特征是头戴带缨的尖顶帽，高鼻深目。其区别在于前者身着长至膝盖的胡服，后者下身着长裤，二人的姿势、容貌、帽式和上身装束几乎一致。孙彦注意到，前者的时代在曹魏时期，后者的时代在十六国的西凉或北凉时期，“其间隔大约一百五十多年。但是从图像的人物造型上来看，其外貌与服饰特征极为相似……可以判定魏晋十六国时期酒泉郡地域内居住着相当多的小月氏人。”<sup>(7)</sup> 可见从曹魏至十六国，河西胡人主要从事畜牧业的生产、生活状况并未改变，可证其鲜受兵燹之灾。



图6 嘉峪关新城 M5 胡人图像



图7 酒泉丁家闸 M5 壁画胡人图像

此外，我们在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中还发现大量头戴尖顶帽，但胡状特征不明显的人物。如嘉峪关新城墓地 M1—M8 为例中就发现 7 例：M6: 037 为牵骆驼图，M1: 07 为拜谒图，M6: 101 为进食图，M6: 044 为宰猪图，M6: 21 为宰羊图，M7: 046 为马车图，

(1) 张朋川 《河西出土汉晋绘画简述》，《文物》1978 年第 6 期，第 71 页。

(2) 同上，第 63 页。

(3) 孙彦 《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 年版，第 242 页。

(4) 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 《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图版 53。

(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酒泉十六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3 页。

(6) 〔日〕园田俊介 《酒泉丁家闸 5 号墓壁画所见十六国时期的河西社会——以胡人为中心》，《西北出土文献研究》(第 3 号)，汲古书社，2006 年版，第 49 页。

(7) 孙彦 《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研究》，第 246 页。

M6:096 为出行图 (图 8)<sup>(1)</sup>。从中我们依然可以将尖顶帽类型分为两类:一类不带飘带,如 M6:044 为宰猪图中正在杀猪的男子和 M6:096 出行图中右边的男子;一类帽在脑后束有两根飘带,见除上述二者外的其它图像。这类帽子可见尼雅遗址出土的锦帽实物,也见于众多贵霜钱币中的国王像。其面容平和,毫无高鼻深目特征,可能是胡化的汉人。但这类人物涉及到牵骆驼、赶牛车等活动,似乎同西域胡人善经商的特点有关,同时其身份较为低下,主要从事仆役工作。他们同身着汉装的人一齐出现,表现出当地和睦、融洽的民族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尝试将人物族属分得很细,如指出编发人物为氏族、披发人物为羌族,另采桑女为龟兹人(图 8-8)<sup>(2)</sup>。这些观点似乎有些牵强,但已经被一些学者所采纳,有待进一步商榷。



图 8 嘉峪关新城壁画墓 M1—M8 中尖帽人物和采桑图

(1) 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 《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图版 55、58、65、67、68、73、81、47。

(2) 同上,第 57、59、60 页。

总的来说，由于受到绘画技法和绘画载体的影响，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砖画上的胡人图像的表现受到一定的限制，很难对其种族进行精确的推论。但我们仍可以发现典型的胡人图像，如同时具有高鼻深目和尖顶帽特点的西域胡人，或髡发的河西鲜卑人等。对于头戴尖顶帽但胡状特征不明显的人物形象，我们应结合具体情景进行判断。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此时河西地区的民族杂居和通婚，胡汉之间的民族融合。

## （二）新疆地区

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罗布泊西北岸雅丹地貌中发现一座被盗的楼兰贵族壁画墓，其中发掘出多幅壁画，其中存留有11幅人物图像，可惜头部被盗墓分子破坏<sup>(1)</sup>。从现存



图9 楼兰壁画墓中的饮酒图

的部分可看到一位右手执高足杯，胡须茂密的西域男子形象（图9）<sup>(2)</sup>。孟凡人教授认为，“墓葬残存的大面积壁画的画风、人物、形象、服饰、手持酒杯的姿势和酒杯的形制等，则颇具粟特壁画风格。”<sup>(3)</sup>陈晓露则指出，这一图像母题为“犍陀罗艺术中十分流行的题材，源于古典艺术中的‘大酒神节’。这个节日来自古希腊人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祭典。……贵霜人占领犍陀罗后，入乡随俗，继承了希腊侨民欢度‘大酒神节’的文化传统，并发

扬光大，在艺术中大量使用这一题材”<sup>(4)</sup>。我们认为，此类饮酒图源于希腊，经希腊化艺术传至中亚后，不仅跟随贵霜文化影响了楼兰的佛寺壁画和墓室壁画，还影响了粟特艺术，进而出现在中古时期的粟特壁画中，其影响力经久不衰。由此也可见中亚各地区、各民族艺术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联系。在楼兰（鄯善）周边的佛寺遗址，以米兰佛教遗址为代表，斯坦因发掘出一些重要的佛寺壁画。其中除了发现著名的有翼人像外，也有此类执杯人像的发现，其头部完好，可以视为同类图像母题的重要参照<sup>(5)</sup>。

## （三）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魏晋墓葬中发现壁画墓不少，主要以辽阳、朝阳地区为中心。年代多为三国时期至西晋，其中有少量墓葬有胡人图像的发现。如1983年辽阳三道壕发现西晋太康年间墓葬，墓壁上书刻文字，有的磨损难辨，能认出45个字，文字内容分为纪年、职官、姓氏、地名、按装记号等，分刻在墓内石壁上。文字间还杂有4幅图像。其中有一“武士像，全高15厘米，作手持长刀，头戴盔，身披甲衣，刻画在第四棺室西壁南端”。从其帽式看，具有胡人特点（图10）<sup>(6)</sup>。

(1) 李青 《楼兰古墓粟特壁画艺术之新发现》，《西北美术》2004年第3期，第16~19页。

(2) 同上，第19页。

(3) 孟凡人 《楼兰考古学的重要性与开展楼兰考古工作的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可行性》，2003年新疆库尔勒楼兰学术研讨会论文。

(4) 陈晓露 《楼兰壁画墓所见贵霜文化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2期，第79~80页。

(5) [英] 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 《西域考古图记》（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图139。

(6) 辽阳博物馆 《辽阳市三道壕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90年第4期，第336页，图版4。

1973年至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朝阳周围发现北燕石室墓,其中有壁画。北庙村一号石室壁画墓中发现人物图像,其中有一幅“妇女汲水图”值得注意。报告指出,“汲水女髡头、顶结双环髻,结彩带,两鬓垂发;身着间色裙;眉间、眉梢、口唇及脸颊部位,均点染红彩,

汲水女身体健壮,似为佣作的鲜卑劳动妇女形象。”(图11)<sup>(1)</sup> 其中还有髡头敛发的男性形象,但是尺寸较小。报告将其定为十六国晚期的北燕,其壁画中有黑犬图像,同文献记载鲜卑与乌桓同俗,有“肥养一犬”的习惯相同,故墓主人很可能是鲜卑贵族。



图10 辽阳三道壕晋墓胡人图像



图11 朝阳北庙村一号墓鲜卑女性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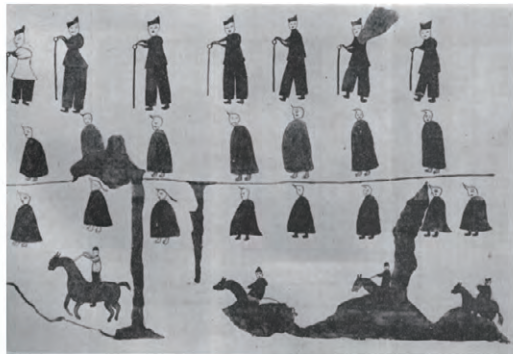


图12 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少数民族形象

#### (四) 西南地区

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的形象。其中除了有本地土人形象外,还有头戴尖顶帽的胡人形象。该墓葬年代为东晋太元十一年至十九年之间(386—394)。以“西壁下层壁画”为例,中部有两排少数民族部曲,报告称其“梳‘天菩萨’(发髻)、披披毡、赤足,与今天大小凉山彝族的装饰相同,无疑是彝族的先民了……即《华阳国志·南中志》所云的‘夷汉部曲’”(图12)<sup>(2)</sup>。在该图最下排中,有骑马头戴尖顶帽的胡人形象。

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年代比蜀汉晚一百余年,却持续有胡人图像发现,说明

(1) 朝阳地区博物馆、朝阳县文化馆《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第923页,图版8。

(2)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第12期,第5页,图版3。

三国两晋时期，云中、建宁一带有胡人长期居住。宿白先生指出，蜀魏相峙时，蜀佣胡兵<sup>(1)</sup>。《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引《诸葛亮集》云：“（刘）禅（建兴五年，227）三月下诏曰……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克复旧都在此行也……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这些月支胡和康居胡等，皆是头戴尖顶帽的西胡人。蜀国降晋后，大批权贵大族内迁至中原，但可能遗有一批西域胡人留寓蜀地同当地少数民族杂居<sup>(2)</sup>。

除以上四个地区，江南地区也值得注意。江南地区是六朝统治的核心区域，但是其墓室装饰中胡人图像却发现甚少。一方面，壁画墓不在本区流行，而是流行模印砖画；另一方面，这可能与南北方胡汉对峙时的特殊背景有关。

2000年7月15日，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尹西村工业园施工人员在平整土地过程中发现一座古墓葬，其中发现了一块人面楔形砖。报告称“人像大眼圆睁，眼珠高突，鼻长而尖，下颌前伸，耳肥大，细颈、头戴尖顶帽，帽尖前弯，衣领宽大，整个形象作胡人状。刻划用笔简单，但人物面部特征鲜明，特别是衣领处寥寥两笔，即将宽肥的衣领表现得惟妙惟肖，体现了一定的绘画技巧。砖残长28.5、最宽16.5、厚4.1厘米。”（图13-1）<sup>(3)</sup>

从技法上看，这一砖刻划人物并非本区流行的模印砖画，而是工匠在泥胚上直接刻划所成。报告称同时出土的砖画均为楔形砖，“侧面模印莲花、方胜纹和网纹等”<sup>(4)</sup>，足以见其特殊。这一砖画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情，为目前六朝砖刻划胡人之重要发现。报告将墓葬年代定为东晋中晚期至南朝早期。

从形象分析，这一人物的头饰怪异，并不同以往的尖顶帽类型，而是发髻前凸，且并非尖顶，而是圆顶，因此有必要对其专门讨论。这种头饰可见于1989年云南个旧



图13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东晋墓出土砖刻划人像  
与云南个旧黑马井村东汉胡人灯座

(1) 宿白《四川钱树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中国南方发现的早期佛像札记》，《文物》2004年第10期，第63页。

(2) 金维诺先生在《中国早期的佛教造像遗存》一文（载金维诺《中国古代佛雕：佛造像样式与风格》，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中注一转引《隋书·何妥传》：何妥“西域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郫县何氏最早有司空何武，由此看来，胡人入蜀至迟可上溯到西汉后期。

(3) 贺云翱、邵磊《南京市铁心桥王家山东晋晚期墓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11期，第53页。

(4) 同上。

黑马井村出土的一件东汉铜俑灯座(图13-2)<sup>(1)</sup>。其姿势跪坐,裸身,高鼻深目,最夸张的是其头饰,用一网格状物罩住头发,在额头上方挽成一个前凸的纽。这与铁心桥东晋墓胡人像的头饰非常接近。这种发饰跟斯基泰式的尖顶帽有明显不同。云南地处偏远,或受到“滇缅道”的影响,胡人族群与北方而来的尖帽胡人不同。有学者指出,从六朝时期入华胡人的国别出发,大致以刘宋朝为界,其族群或国别发生了一次转型。“此前建康的侨居胡人社会似以西域内陆国家如康居国、月氏国等为主,此后则以西域濒海国家如天竺国、扶南国等为主。”<sup>(2)</sup>因此,铁心桥东晋墓出土石刻划胡人像存在“图像证史”的方法论意义<sup>(3)</sup>。

## 二 北魏时期

人们长期以为北魏壁画墓以洛阳为中心。直到近年,考古发现一些平城时期的壁画墓,这一传统观点才得以改变。其中涉及到不少鲜卑人物形象问题。

1993年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现一处已经遭到破坏的北魏大型壁画墓,有20余平方米尚存。<sup>(4)</sup>其中鲜卑人的形象已经流露出胡汉杂糅的特征,“人物都穿着前领开衩的宽袖长衫或短衫,成年男子都头戴二梁冠、脚穿脚尖上翘的鞞靴,女子头顶起髻,可以看出其年代约在北魏孝文帝开始实行新服制以后,迁都洛阳以前……通过对狩猎场景的描绘展现了鲜卑人游牧射猎的传统。画面中我们看到墓主人乘坐辎车,居于画面中央偏后处,在他的前方是策马张弓、追逐动物的随从,以及奔跑的飞禽走兽和猎犬。山峦间还可见到河流、树木和隐蔽的老虎。画面真实地反映了鲜卑传统的游牧射猎生活”<sup>(5)</sup>。

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同沙岭村附近发现北魏时期墓葬12座,其中M7破多罗太夫人墓发现壁画和漆画,成为平城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其中北壁面积巨大,约6.43平方米。其上绘有“第二行和第七行是头戴红色风帽、身穿红色披风、手执长矛和弓箭的士兵(图14-1)……第三行和第六行是扛幡持节的男侍卫,第四行和第五行是抬鼓、吹奏、表演和杂耍的男、女乐伎,其中有额上顶幢、倒立表演的百戏,还有头戴长缨兜鍪的兵士在手舞足蹈。……车后有头戴鸡冠帽的轻骑兵(图14-2)、甲骑具装的重骑兵和男女侍仆随从”<sup>(6)</sup>。西壁壁画两侧也各有一位武士(图14-3、4),举刀置于肩上,另一首将盾高高举起,图像漫漶。另,“甬道的两侧,各有一名戴盔披甲、面目丑陋、脚穿黑履、拿刀持盾的武士,武士穿戴相同而动作相反”(图14-5)<sup>(7)</sup>。

北魏平城时期的胡俑,如呼和浩特大学路北魏墓、太和元年(477)宋绍祖墓等发

(1) 文物精华编辑委员会《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

(2) 叶德荣《汉晋胡汉佛教论稿》,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

(3) 笔者注:今日印度锡克教徒在非正式场合还是习惯用布将自己的头发挽成一个纽,置于头顶前额的位置,可能是对这一古老民族传统的传承。

(4) 《和林发现北魏时期大型砖室壁画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3年第6期,第61页。

(5) 温雅棣《史记丹青——和林格尔两座壁画墓的比较研究》,《肇庆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23页。

(6)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第16页。

(7) 同上,第23页。各图分见简报图38、39、45、47、48。



图 14 破多罗太夫人墓中的鲜卑人图像

现的镇墓武士俑<sup>(1)</sup>同该墓武士壁画类似，另有雁北师院 M2 发现有“额上顶幢、倒立表演”的西域胡俑<sup>(2)</sup>，可知大同沙岭墓壁画中武士图在墓中的意义同此类胡俑类似。另外，该墓壁画中发现的头戴鸡冠帽的轻骑兵图像同北齐贺拔昌墓发现的报告中所谓“杂技俑”几乎一致<sup>(3)</sup>，可证葛承雍先生推断此“杂技俑”为骑兵俑残件所言不虚<sup>(4)</sup>。此外，敦煌壁画中的外国王子图中也有此类鸡冠帽人物形象。

2009 年发现了大同富乔垃圾发电厂九号北魏墓，是继北魏沙岭壁画墓之后大同市发现的第二座保存较为完整、带有明确纪年的北魏壁画墓，其墓主人为北魏散骑常侍梁拔胡。山西考古所张庆捷指出，“四壁绘有狩猎图、墓主人宴饮图、杂耍乐舞图、人物图、牛耕生活图以及车马毡帐图等内容，场面宏大热烈，内容丰富多彩……在墓主人画像右边，是许多侍者形象。其中一个胡人形象特别引人注目，说明胡人早在文成帝时期已经与高级官员紧密联系”<sup>(5)</sup>。虽然该胡人图片未发表，但我们要注意北魏平城时期胡人在政权中具有一定的地位。

北魏平城时期墓中头戴鲜卑帽的鲜卑人形象，可见于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

(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第 7 期，第 26 页。

(2) 古顺芳《大同北魏墓葬乐舞俑初探》，《文物世界》2004 年第 6 期。

(3)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贺拔昌墓》，《文物》2003 年第 3 期。

(4) 葛承雍《丝路古道与唐代胡俑》，《乾陵文化研究》(四)，三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10~116 页。

(5) 张庆捷《大同电厂北魏墓题记壁画初探》，《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年 11 月 5 日第 5 版。

画<sup>(1)</sup>、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等<sup>(2)</sup>。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魏贵族沿袭了壁画墓的使用。洛阳地区北魏壁画墓发现虽然不少，如孝昌二年（526）元义墓、孝昌三年（527）元暉墓、永安三年（530）孝庄帝静陵、太昌元年（532）王温墓和元怱墓等，但是大多损毁严重，几乎没有胡人图像保留。元怱墓甬道两侧壁画虽各绘武士二人<sup>(3)</sup>，但是并不表现为胡人外貌，反而受到六朝清秀人像的影响。但是在石椁墓上的线刻画中有胡人图像，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早年流失海外的孝昌三年（527）宁懋石室中的武士像。在其石椁门的两侧，各站有一位高鼻深目，怒目圆睁，身着明光铠的胡人武士（图15）<sup>(4)</sup>。

2011年，陕北靖边地区统万城附近有一组北魏晚期至西魏时期壁画墓发现，其中尤以八大梁M1墓最为重要。其墓主人可能是北朝时期统万城的居民，其壁画流露出浓郁的宗教气氛。该墓位于距离统万城3.7公里处的靖边县红墩界镇白城则村五队八大梁，墓室呈歇山顶梁柱式结构，四壁均有壁画。其中墓室北壁壁画较复杂，可以分为三部分。



图15 宁懋石室中的胡人武士

报告认为，第三部分表现胡僧礼拜舍利塔的画面。画面西侧有一树，树西侧有一须弥座、华盖、摩尼宝珠装饰的舍利塔，塔上部有二飞天，下部有六名僧人（图16-1），“体态较小，东西向一字排开，除最东侧者回头东望以外，其余五僧均身体向西斜侧，头顶可见浓密黑发，高鼻，鬓角至下颌表现或浓密或淡疏的须发。双手或掩于袈裟下或出露屈指执细长斜弧莲茎。外披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祇支和长裙，脚穿尖头靴或未表现鞋靴样式。西侧为一侧身而跪的胡人形象，面东而跪，头微仰，面部情平静而虔诚，高鼻，双臂内曲，双手相合，腹部微凸，臀部浑圆。头戴小胡帽，似为卷檐虚帽，表面可见纵向缝合线。帽子下露出黑密微卷的头发，鬓角至下颌以及人中两侧至嘴角两侧均可见黑密微卷的须发。外穿圆领窄袖袍服，腹下腰间可见袍服腰带，两端伸出体外。下身穿裤，于脚踝处束起；脚穿尖头靴”（图16-2）<sup>(5)</sup>。另，墓室东壁壁画左右各绘有一位胡状力士，被莲花簇拥，“两尊力士造型基本一致，身体粗短，大眼圆睁，鹰钩高鼻，双手叉腰或举过头

(1) 王银田、刘俊喜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文物》2001年第7期。

(2) 刘俊喜、高峰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文物》2004年第12期。

(3) 徐婵菲 《洛阳北魏元怱墓壁画》，《文物》2002年第2期。

(4) 郭建邦 《北魏宁懋石室线刻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陕西靖边县统万城周边北朝仿木结构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3期，第11页，封二、图版4。

顶。黑发于头顶束成小髻，八字胡外撇，两鬓及下颌须发浓密，戴大耳珰、项圈及手镯，上身及双腿袒裸，腰系裹布，跣足”（图 16-3）<sup>〔1〕</sup>。报告指出“墓室北壁西侧的礼拜佛塔跪姿胡人头戴虚帽、身穿圆领窄袖袍服，应为一位粟特信徒，很可能为该墓墓主人的形象。而若要将其与西壁出现的相对年轻的坐于胡床上的僧人形象和南壁的老年坐于胡床上的僧人形象做一点尝试性的关联，可能的解释之一是壁画内容表现了墓主人生前信仰佛教的经历。”<sup>〔2〕</sup>

笔者认为，西胡人物图像的配置在北魏时期并不罕见。西胡俑在北魏墓葬中时常出现，故而将身着具有粟特形象特征的跪姿胡人定为墓主人并不可取。从图像反映的宗教内容看，我们可以得出居住在统万城的粟特人曾皈依佛教的结论。赫连勃勃筑统万城，其位于东西方之交通要道，往来西域商贾、使者、僧人络绎不绝。北魏灭北凉后，曾将活跃在北凉首都姑臧的西域粟特人经统万城迁到平城<sup>〔3〕</sup>。粟特人早先受贵霜王朝笃信佛教，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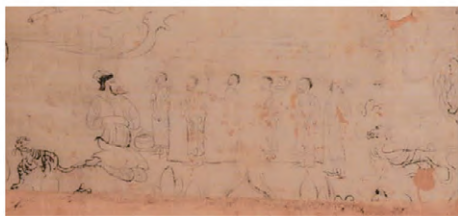


图 16 靖边县统万城八大梁 M1 中的胡人、力士与僧人图像

国僧人经常往来中原传教；后来贵霜势力衰弱，粟特人受到萨珊波斯影响皈依了火祆教，但仍遗留有少量佛教信众。此外，长期居于中国的粟特人受到佛教影响，也有转而崇佛的可能。同为火祆教信众的羯胡在石勒和佛图澄的共同影响下逐渐皈依佛教即是先例。

总的来说，北魏墓室壁画中的胡人图像虽然并不少见，但主要以镇墓武士和西胡人物为主，鲜卑族人虽有其特点服饰，但外貌并不胡化。总体而言，壁画数量不多，保存情况均较差，对胡状外貌的表现不细致，需要我们结合北魏墓葬中发现胡俑图像进行对比研究。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靖边县统万城周边北朝仿木结构壁画墓发掘简报》，第 10 页，图版 4。

〔2〕 同上，第 17 页。

〔3〕 荣新江《中古中西交通史上的统万城》，载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1 页。

### 三 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时期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北朝后期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壁画墓屡有发现。东魏（北齐）的壁画墓主要集中在邺城周边、晋阳周边和山东地区。西魏（北周）的壁画墓主要集中在西安周边和宁夏固原地区。

首先，邺城周边。邺城所在的河北省南部和河南南阳附近，有大量东魏、北齐壁画墓发现。东魏壁画墓主要有吴桥小马厂村两座东魏墓、武定五年（547）高长命墓、武定五年（547）赵胡仁墓、武定二年（544）李希宗墓、武定八年（550）茹茹公主墓等。北齐壁画墓主要有天统三年（566）赵昂墓、天统三年（566）尧峻墓、武平六年（575）范粹墓、武平七年（576）文宣帝妃颜玉光墓、武平七年高润墓、磁县湾漳大墓等。

遗憾的是，邺城周边的北朝壁画墓大都被盗严重，壁画严重损毁。茹茹公主墓、湾漳大墓、高长命中壁画虽然较完整，但仅发现一些武士、仪卫人物面部特征具有部分胡状外貌，但不能认为为胡人。如湾漳大墓墓道西壁第42人，是一位头戴额护、身着裊裆铠的武士。“其双目炯炯，两道剑眉紧蹙，高鼻，高颧骨，嘴较大，连鬓胡须，面部渲染恰到好处，执仪仗的同时还持一柄仪剑，一派威武彪悍的气度，是壁画人物中的佳作。”（图17）<sup>〔1〕</sup>



图17 磁县湾漳大墓壁画中的胡貌武士

另外，高长命墓“墓门两侧，各画一门卒，头戴缨盔，身披铠甲，手执骨朵。门上画红色火焰，再上是两个人身兽首鸟足的异物”<sup>〔2〕</sup>，可惜头手均脱落，仅留身足。报告从它们的形状和位置来看，推测其应为神荼与郁儡。此二人形象可能同宁懋石室中的武士类似，具有胡状外貌。可惜残损太甚，未能明辨。

其次，晋阳地区。晋阳地区的北齐壁画墓发现很多，同晋阳是北齐另一个重要的军事、政治中心有关。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太宁二年（562）库狄迴洛墓<sup>〔3〕</sup>、武平元年（570）东安王娄叡墓<sup>〔4〕</sup>、武平二年（571）武安王徐显秀墓<sup>〔5〕</sup>、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sup>〔6〕</sup>，以及2013年发掘的忻州

〔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彩版56。

〔2〕 河北省文管处《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3期，第25页。

〔3〕 王克林《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

〔6〕 李政《山西忻州北朝壁画墓学术意义重大》，《中国文物报》2013年12月27日第1版。

九原岗墓<sup>(1)</sup>等。其中有一些胡人图像的发现，尤其是西域胡人图像，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娄叡墓墓道东西两壁壁画中的出行图中绘有胡人商队的图像。其中有胡人牵着牛车满载货物、毡帐的场景。从外貌看，该胡人头戴毡帽，高鼻深目，头发卷曲，其为西胡粟特人的可能性极大（图18）。



图18 娄叡墓壁画驼队图中的胡人图像

徐显秀墓中壁画也有西胡人形象，位于墓室东壁墓主夫人出行图的牛车旁。一头健硕的公牛拖着一辆豪华富丽的卷棚顶牛车，驭手正在手拉公牛的缰绳，旁边还有一头戴毡帽、髭须茂密的胡仆或商胡。



图19 徐显秀墓壁画牛车身后中的胡人图像

在墓室正面墓主人和乐伎图中，墓主人身边围绕着多为演奏琵琶、箜篌等西域乐器的乐手，流露出浓郁的异域风情（图19）。

北齐库狄迴洛墓中壁画破损非常严重，发现人物画两幅，图像为四男人并列，其中第一人“上身赤裸，袒胸露腹，下着灰短裤，挽褶至膝。脚胫以红带缠裹，扎结垂缨，赤足。作右手伸臂，左手按膝，右足上举，左足独立姿式。手足缠裹的彩带，激荡飘起，俨然是一个手舞足蹈杂技人物图像。”<sup>(2)</sup>可惜头部泥皮脱落，只存身躯，但根据其动作大致可推断其为胡杂技人物。

2013年山西忻州发现的九原岗北朝壁画墓是继徐显秀墓之后山西地区发现的最重要的北朝晚期壁画墓，其主要图像尚未发表。据《中国文物报》披露“该墓为带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墓，在残长30.5米的墓道东西两壁上，壁画自上而下各分为4层。第一层主体彩绘仙人、畏兽、神鸟等形象；第二层北段壁画为长卷式狩猎场景，所绘人物、动物形象生动，狩猎内容丰富。第三、四层均为出行队列，为形态各异的站立武士形象。……壁画内容中胡汉融合的特征明显，徐光冀评价，此墓证明了至少在北朝晚期，忻州就是一个胡汉相融、文化多样的重要地区，凸显了其在北朝时期的重要位置。”<sup>(3)</sup>笔者在2013年11月对该墓壁画进行了实地考察，经与领队渠传福先生讨论，发现有数例疑

(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2期。

(2) 王克林《北齐库狄迴洛墓》，第398页。

(3) 李政《山西忻州北朝壁画墓学术意义重大》，《中国文物报》2013年12月27日第1版。

似胡人图像。其一，牵马图。图左端人物为另一人牵马，左端人物发饰为剪发，不戴帽，其容貌、服饰极类梁元帝《职贡图》所绘之滑国国使，唯其面目清秀，貌不甚胡（图 20-1）。其二为仪仗图中的胡人武士，其发饰同汉族、鲜卑族武士无甚区别，唯其高鼻深目，髭须茂盛，身穿交领袍服，腰中束带，手执长兵器。其身份应为北朝军中的西胡武士（图 20-2）<sup>（1）</sup>。由于笔者获取资料时，该墓尚在发掘中，故涉及壁画中的胡人图像与胡汉关系问题有待进一步调查。



图 20 山西忻州发现的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中的胡人图像

山东地区是北齐壁画墓发现的另一个集中区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临朐发现的天保二年（551）崔芬墓、济南武平二年（571）祝阿县令□道贵墓、济南东八里洼北齐墓、淄博武平四年（573）徐州长史崔博墓等。其中临朐崔芬墓的壁画保存较好，有胡人图像的发现。两幅武士图，位于甬道东、西两壁上。圆瞪双目，留有短髭须，貌甚威武。头戴甲冑，身着明光铠，一手按盾，一手悬剑，同镇墓武士俑比较接近（图 21-1）<sup>（2）</sup>。另，墓室北壁下部（东）右起第一牒有一幅女伎舞蹈图，由于图像残损，人物族属不易分辨（图 21-2）<sup>（3）</sup>。但郑岩认为这表现了受中亚影响的“胡旋舞”，“同 1985 年宁夏盐池县唐代 6 号墓石门上雕刻的舞蹈的胡人舞姿极为相似”<sup>（4）</sup>。山东嘉祥英山隋代开皇四年（584）徐敏行墓中墓主人夫妇画像前，也有类似的胡人舞蹈的图像。

另，济南武平二年（571）祝阿县令□道贵墓壁画中，其东壁北端绘有执仗仪卫二人，南端绘有一匹鞍马，“马前一驭吏，束发，手执鞭，马尾绘一驭役，深目高鼻，朱唇卷发，貌似西域胡人，着翻领窄袖衫，腰束带，身后侧有一收拢的伞盖，一手持鞭，作回首探望之状”<sup>（5）</sup>。

1971 年山东益都还发现有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其风格同北魏晚期的线刻画像石比

（1） 图片由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庄蕙芷博士拍摄并提供。

（2）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朐县博物馆《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文物》2002 年 4 期，第 8 页，图 14。

（3）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72 页。

（4） 同上，第 271~272 页。

（5） 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马家庄北齐墓》，《文物》1985 年 10 期，第 47 页。



图 21 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中的武士图和胡旋舞图

较接近，并具有明显的外来内容，涉及到若干胡人图像<sup>(1)</sup>。

西魏、北周壁画墓目前已经发现多座，如固原保定五年（565）宇文猛墓、固原天河四年（569）李贤墓、建德四年（575）田弘墓等。遗憾的是，由于保存较差，这些墓室壁画中暂未发现胡人图像。2000年西安炕底寨村发现的北周大象元年（579）安伽墓中有刻画精细的墓门石刻和石屏围榻<sup>(2)</sup>，2003年又发现了北周史君石椁墓<sup>(3)</sup>，其中发现很多精彩的胡人图像。其涉及到粟特胡与火祆教之美术问题，笔者将另撰文。

#### 四 结论

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中的胡人形象问题是十分复杂的。本文分别从时间和空间出发，大致将其分为三期，即魏晋十六国、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时期。本时期壁画墓主要流行在中国北方，故本文涉及六朝材料并不多。在不同的时空下，墓室壁画中的胡人形象流露出各自的特点，涉及到族属来源、宗教信仰、胡汉关系等复杂问题，表现出“传承”和“分立”的大趋势。本文通过分析论证，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魏晋十六国时期。魏晋初，胡人的种族来源基本上沿袭了汉代，仍以头戴尖顶帽的贵霜（大月氏）胡人为主。秃发鲜卑逐渐进入河西地区，同汉人、羌人、小月氏人杂居。三燕之地是鲜卑慕容部的势力范围，部分保留了汉代以来的壁画墓传统。西南地区的胡族同当地彝族山民杂居。以上三地均地处偏远，具有文化滞后性，反而保存了汉代壁画墓的一些因素。江南地区流行的砖画中仅发现一例胡人形象，可知胡族来源在东晋、南朝间发生了变化，从西北印度向中南印度和沿海诸国转移。这可能同海上丝绸

(1) 山东省益都县博物馆 《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第49~54页。

(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3)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

之路的繁荣有关。

其次，北魏时期。近年考古工作为北魏平城时期的壁画墓提供了不少新材料，鲜卑与西胡人形象时有发现，可以同胡俑进行对比研究。从靖边统万城八大梁北魏墓中，我们发现粟特胡人尝皈依佛教的证据，这涉及到北朝入华两大宗教火祆教和佛教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进入洛阳时期后，受到南方秀骨清像的人物影响，墓室壁画中几乎不见外族形象。

最后，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时期。审视现有考古材料，北齐墓室壁画中的胡人形象不少，涉及商旅、仪仗、胡乐舞诸多题材。与之相比，北周鲜一汉官员的墓室壁画中鲜有胡人图像，仅出现在安伽、史君墓为代表的西胡人墓葬中。这说明了北齐、北周政权对胡人态度的差异。陈寅恪先生尝指出，北齐是一个“西胡化”很强的政权，其文化根植于六镇势力中反对汉化的势力。墓室壁画中频现的胡人是北齐“西胡化”的有力证据。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地域、民族、文化多样性极大、长达三百年的时代。墓室壁画仅仅是魏晋南北朝艺术史中的一个小问题。本文撷取的“胡人”又是墓室壁画中的一个小题材。本文期待通过对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中胡人形象的“管窥”，解读其在文化史中留下的蛛丝马迹，揭示其传承与分立的发展规律。这也是从美术考古角度对“图像证史”方法的一个粗浅尝试和应用。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

收稿日期：2014-08-27